

編後語

自1949年以來，中國少數民族教育發展歷經變遷，在制度體系、師資隊伍、投入支援等方面都取得長足的進步。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刊發了三篇專文，與讀者探討少數民族教育面對的機遇和挑戰。菅志翔、馬戎概述了當前中國各地民族語言教育的現況，認為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密不可分。少數民族學習和掌握漢語文固然是學習現代知識和實現就業的客觀要求，但繼承和發揚母語文的感情和願望亦必須得到尊重；如何在促進社會現代化與兼顧民族感情之間拿捏分寸，在考驗政府各級部門的管治智慧。王娟認為目前有關少數民族高考優惠的政策往往被簡化為「民族加分」，相關討論聚焦於「公平」與否，而沒有充分了解政策背後的價值觀，以及在各地執行時千差萬別的情況。未來的政策改革方向應該對考生進行精細的分類，讓「加分」盡可能精準地惠及經濟和教育資源匱乏的弱勢群體。李健以中國藏族地區為例，探討民間職業教育對於培育人才和緩解民族地區就業壓力的重要意義，認為當局可以在政策上加以配合，在註冊登記備案和日常管理方面對民辦職業技能機構作彈性安排；鼓勵民辦職教與公辦職教進行交流合作，拆除制度性障礙；建立與中、東部地區的對口支援和協作機制等。

本期刊出三篇學術論文，主要探討清末以迄共和國初期中國外交與地緣政治問題。日俄戰爭後，日本通過鞏固日英同盟關係，並與法、俄、美等國相互承認在華權益，形成對中國的外交包圍。林曉萍梳理了清廷如何逐漸認識聯盟外交的重要性，並詳述在袁世凱、載灃的推動下兩次嘗試締結中德美聯盟的來龍去脈。不過，由於內部人事與外在形勢的變化，清廷的聯盟外交實踐最終功敗垂成。抗戰時期，東北抗日聯軍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在共產國際和蘇聯遠東方面軍的主導下，在遠東城市伯力召開了兩次會議，蘇方試圖以此整合和利用東北抗日力量。郝江東的研究發現，兩次伯力會議的召開都是以防範日本帝國主義、為蘇聯遠東戰略服務為目標。自1950年代起，對外援助一直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張安指出，1956至1966年，中國對阿富汗的經濟和技術援助經歷從「以蘇為主」到「與蘇爭奪」的轉變，由初期僅提供有限度援助到中蘇關係惡化後提供大規模援助。然而，中國對阿援助既未能削弱蘇聯對阿富汗的影響力，亦沒有從根本上推進中阿關係。

著名文學家齊邦媛在3月下旬遽然離世，海峽兩岸的民眾深表哀悼。以齊先生所著的《巨流河》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回憶錄，史料價值彌足珍貴，唐小兵撰文綜論二十世紀中國回憶錄在建構歷史記憶方面的重要意義。